

飞奔而去

胡颖尧

二零一九年的春假和往年一样，与孩子们的春假正好错开。我不能把孩子都丢给太太，一个人独自旅行，但是又想做一些新鲜的事。于是就写下了这十几篇短文，来真实地记录我上高中以前的一些经历。也算是穿越时空的一次独自旅行。

没有吃肉

杀猪我小时候见过。一刀下去，赶紧用盆接着血。那时候能吃的东西一点也不能浪费。据说宰牛的时候牛会流泪，不知为什么我没敢去看过。不过听爸爸讲过184团子女学校里一头黑牛的故事。

兵团学校也和连队一样，基本是自给自足。暑假里老师们都要忙着为过冬做好准备。这年爸爸的任务就是赶着牛车把四连地里的麦秆运回学校。每天两个来回，这头黑牛变得特别听爸爸的话。渐渐地别人使唤不动这牛了。八月的一天，校长说，今天不拉麦秆了，去二连接一个新老师。二连比四连远，一天才能走一个来回。爸爸就赶着牛车早早地出发了。据说，在二连的一个地窝子里接到了一个不太爱讲话的小姑娘。爸爸帮她装好了箱子，叫她坐在前面。小姑娘一句话也不说，就一直坐在牛车的最后面。其实这小姑娘比我爸还大一岁。我知道这个，因为她就是我妈。多年以后，我爸曾经给过我一条找老婆的建议，我一直觉得很有道理。

戈壁滩上的梭梭柴是过冬的必备。打柴自然成了我爸和老黑牛的任务。一般他们会很早就出发了。戈壁滩本来就没有路，爸爸会任凭老牛按着自己的节奏走。一般快到中午时分，才到达打柴的地方。由于日夜温差大，进入戈壁要带上四季的衣服。当太阳升起后，就要一件一件地脱掉。常常在打完柴开始装车时，已经是赤膊上阵了。返回的时候，爸爸会陪着老黑牛按着它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走。终于有一次，老黑牛在回来的路上不肯走了。天慢慢地黑下来了。爸爸就把妈妈给他带的糖包子给牛吃。牛吃一个走一段，吃一个走一段。入夜的戈壁还是很危险的。深夜的时候，我妈急了，叫了几个学生才把我爸找回来。

要过春节的时候，学校里没有肉分给大家。领导就决定把那头老黑牛宰了。我爸说，分肉的时候他没去，那个春节也没有吃肉。

也不在家

我出生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十师 184 团的团部卫生队。据说我在托儿所里见到带我的阿姨就哭。那阿姨是学校老师的家属。妈妈就带我到她家里，试图让我和她建立起感情和信任。可是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仍旧见了她就哭。最终妈妈不舍得了，就把我抱回了家。我大概十个月的时候，爸妈白天要上班，就用绳子把我拴在床上。绳子的长度正好不让我爬下床。终于有一天，我挣脱了爬到门边。那是两扇关不严的破木门。外面冰天雪地，据说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冻紫了。吃苦要趁早，大概也不过如此。当然这些事我是一点也不记得了。

我有窗台那么高的时候，爸妈白天上班还是把我锁在家里。现在我都清晰的记得，他们在外面锁门的时候，锁和铁环落在木门上的声音。不过这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心理阴影。他们可以在外面锁上门，我就可以自己打开窗。和他们说完再见，我会等一会儿。然后爬上窗边的桌子，从窗户跳出去，最后当然不能忘记把窗关好。

有时候，我会去葫芦瓜地。因为葫芦瓜的雌花里有蜜，而且很甜。不过瓜地没有遮挡，即使是小孩也很容易被看见。所以我不常去。如果能碰到小伙伴，我们会去玉米地里捉迷藏。玉米长到一两个指头粗的时候，玉米芯是软的可以直接吃。味道有一点点甜。据说玉米杆接地的地方如果是紫色的，这个玉米杆就会是甜的。不过扳倒一整颗玉米动静太大，我们不常干。黄瓜地周围有围墙，进去了不太容易跑出来。围墙是夯筑的，顶上是平的。我们会在墙顶上走来走去，寻找摘黄瓜的机会。其实，我最爱去的地方是没有人烟的戈壁滩。一眼望去，无边无际。上面是天，下面是地，中间是我。

不过我不贪玩。爸妈下班之前，我会按时翻窗回家。小心翼翼地擦掉桌上的脚印，等待他们回家。多年以后我回到上海读研究生，又有机会和爸妈经常见面。有一次不经意提起这事，爸妈才知道，那时白天我也不在家。

----- 做过贡献

（提示：本文可能引起不适，请勿在吃饭前后阅读）

那时兵团的小学需要学生自己带凳子。我的凳子就是一截树桩，就像动画片里神仙下棋时坐的那种。不过我的树桩上钉着一个钉房梁用的蚂蝗钉，以方便搬运。大概是树桩锯的不平，或者是因为教室的地面坑坑洼洼，我的凳子总可以坐着晃来晃去。一般我只在老师不在的时候晃，省的给自己惹麻烦。

上学的路上有一小片灌木丛。春天的时候我时常会摘上面的花骨朵吃。当然我也是看着别人吃了，才去尝的鲜。那时候，不苦不涩的植物，大概都有人吃。渴了，我会在小溪边，挑个看着干净的地方，趴在地上喝点水。戈壁滩上是没有自然的小溪的。那水估计是人工从别处引来的。我记得我在溪水里见到过西瓜子大小的扇贝在游，它的壳是半透明的黄褐色。有时还会见到巴掌大小的长的像马蹄蟹的东西。由于那个小尾巴有点吓人，小伙伴们都说那东西会吸血，所以我从来没敢抓过。至今我仍旧不太理解那水里怎么会有

这些生物。时间久远了，我都心虚那些是不是在梦里看到的。

这样的水喝下去，自然要有后果。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，许多小朋友都和我一样肚子里有寄生虫，经常拉肚子。我一般是挑晚上的时候到外面去拉。漆黑的夜里，我会挑个看得见家里灯光的地方。如果需要白天的时候去，就要找个有遮蔽的地方了。白天拉的好处是可以看见自己的屎。暗褐色的稀屎里有上百条铅笔芯粗细的白色小虫，甚是惹眼。小虫们开始的时候会不停地蠕动，慢慢才会消停下来。所以我有时候还会多看一会儿。晚上我会告诉我妈有虫。她会搬个小凳坐下，让我横卧在她的腿上，一点一点地把肛门里能看见的虫子都挑出来。我趴着自然看不到妈妈当时的表情，不过我知道她是个很坚强的女人。

虽然小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环保，我也并不担心把我家附近搞的太难看。田里需要施肥，自然有人会挑着箩筐四处拣粪当肥料。这样说来，虽然我糟蹋过不少庄稼，也算为农业生产做过贡献。

飞奔而去

我出生以后，兵团里就已经不住地窝子了。住家的房子是由掺着麦秆的土块建的。由于雨水不多，大概两三年才要上一次房泥。屋子里有个炉子用来做饭和取暖。我妈做饭的时候，我负责摇鼓风机。产生的烟是通过长长的管子导出去的。所以谁家在做饭一眼就看的出来。这也给爸妈带来过麻烦。生我哥的时候正赶上忆苦思甜，不允许自家做饭。结果我家的烟囱给组织报了信。我爸为此遭到了批评教育。冬天的晚上要给炉子多添点煤，这样可以睡的暖和些。这可是个技术活。因为搞不好会一氧化碳中毒。不过因为门窗都漏风，估计最多也就是把人搞得晕晕乎乎的。

其实煤是后来才有的，之前是烧梭梭柴。每家基本都有个放煤的小矮屋。我家的煤屋冬天的时候也当冰箱用。里面曾经有过一整只扒了皮的黄羊。那是五连的一个朋友开着拖拉机到戈壁滩上打的。要吃肉的时候，我妈就让我拿着砍柴的斧子去砍一些肉下来。烧羊肉的盐是附近的盐湖里挖的。其实这些野味并不好吃。黄羊在戈壁滩上为了生存，善于奔跑，所以肉很紧。黄羊是保护动物，但是戈壁滩上的兔子肯定不

是。抓兔子要好几个人，因为兔子窝的每个出口都要有人把守。然后在其中一个出口点火放烟，兔子受不了就会往外跑。我太小没人请我一起去抓过兔子。不过我在戈壁滩上曾经和一只野兔对视过一会儿。那灰色的兔子直起身，竖着耳朵看着我。它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恐惧。比野兔更常见的是哈萨克牧民的骆驼。双峰的骆驼天生一副被人骑的样子。吃草的时候下巴会夸张地左右移动，像是在憨憨地笑。眼睛好像在说，上来吧，我捎你一段。可惜我从来没有过机会骑骆驼。

戈壁滩上不光有黄羊，野兔和骆驼，还有一些人造的东西。电线杆是比较显眼的。一个个十字架一样的电线杆排成一条直线。站在这线上，你只能看见一个电线杆。稍微偏离一些，就会看到它们一直通到天边。让人感到看见了未来。电主要是用来抽水的。每个抽地下水的水泵都有水渠引水。水渠三面是用水泥板拼起来的。小渠汇成大渠，最后来灌溉庄稼。我喜欢在小渠里玩。从这面的斜坡跑两步再跳到对面的斜坡接着跑。即使掉到水里也不会有危险。大渠里水急，只有大孩子敢这么玩了。大渠的那边有一个雷达站。那里的天线像颗没有松针的松树，整天都在转。那时我小，觉得那天线好高。后来问我爸，他说还不到两层楼那么高。有雷达就有飞机。不过飞机经过我们这里

时都在很高的高空，大概只有一只蚊子那么大。如果我们发现有飞机飞过，所有的老师学生不管在干啥，都会出来在天上找飞机。有一次，手榴弹训练出了事故，有人被炸伤了。当大家知道有直升飞机来接伤员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跑出来瞧新鲜。我记得那飞机越来越大，大家边跟着跑，边估么着飞机会落在哪里。听说那次有个小脚的老太太爬上鸡窝看飞机，结果摔下来去世了。

我家的鸡窝是挖在地下的。估计是按地窝子的思路建的。然后在墙壁上再挖几个小坑让鸡可以在里面孵蛋。有一次黄鼠狼钻进鸡窝。被咬死的鸡太重拖不动，都散落在鸡窝周围。只有一只老母鸡有经验，躲过一劫。妈妈说那只老母鸡和妹妹一样大。鸡可以各家养，养猪的成本就高一些，大概只有公家养的起。那猪圈离我家不远。我时常会跑去看那些猪，就像去动物园一样。猪的眼睛小小的，耳朵大大的。我小时候大概因为瘦，耳朵也显得特别大。其实是遗传的我爸。我爸会说他的耳朵是我妈揪大的。我大一点了才知道那是开玩笑。不过我知道我的耳朵肯定不是我妈揪大的。开始读书以前，我很少挨打。因为我不起眼也不惹事。我喜欢一个人在戈壁滩上闲逛。那里一眼就能望见天边，给我一种奔跑的冲动，让我的心飞向地极。不过我很理性。我穿的鞋不方便跑，跑了还废

鞋。跑久了也容易饿，还要找吃的。我会耐心地在天地间漫步，积蓄生命的力量。然后，带着自己，飞奔而去。

起点低嘛

我爸是 63 年从上海去新疆支边的，我妈要晚一年去。回上海的理念贯穿了他们对孩子教育的始终。当时从 184 团到乌鲁木齐要坐三天的汽车。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火车要开五天四夜。按我爸的话说，我家的钱都撒在了这条铁路上。我上大学之前一共去过三次上海。第一次是一岁三个月的时候。那时妈妈在准备生妹妹，我出了麻疹由奶奶照顾。我十四岁的时候一个人还回去过一次，那是后话了。我能记得的最早一次去上海是在四岁的时候。

我奶奶家离孙中山故居很近。爸爸说他已经送一个摔倒的老太太去医院。那老太太正好是孙中山故居看门的，所以他得以免费进去参观过一次。其实离我奶奶家更近的是赵四小姐的荻园，就紧挨着复兴公园的偏门。奶奶早上会去复兴公园打太极拳。因为我长的像我爸，她特别喜欢带上我。当时那个偏门不开，我们要绕道到雁荡路的大门。奶奶家在街角的一栋西式小楼的二楼。其中的故事据说几天几夜也讲不完。爷爷奶奶一共有四个孩子，我爸是长子。可惜我没有见过爷爷。我曾经见过奶奶年轻时的牵着爸爸的照片。显

然是一个资产阶级阔太太。我们胡家出自绍兴，一支去了杭州，一支来了上海。以前我们在上海有两家店，一家在百乐门附近，另一家在淮海中路的老淮海电影院对面。公私合营后就没落了。

当时我太小，并不知道家族的历史，也不觉得上海滩比戈壁滩好多少。虽然每顿都有的吃，但是也不会让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当然我还是可以四处闲逛瞧新鲜。市内的公交车圆头圆脑地翘着两根辫子。大路上空都是为电车供电的网线，给人一种天网恢恢的感觉。远没有戈壁滩上的电线杆那么霸气。外滩的西洋建筑当时确实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。我想这应该是因为那些地方也不让人进去瞧新鲜，那些繁华和我身边的人也没有有什么关系。黄埔江边那时候只有一堵水泥墙，墙对面的陆家嘴也没有什么风景看，旁边还有臭臭的苏州河。我们去江边主要是去坐轮渡到外婆家。轮渡到江心的时候，就会闻到一些大海的气息，那是以前没有经历过的。轮渡的门一开，大家都跑着去挤公交车。这也是以前没见过的。

外婆家在洋泾镇的主干道上。隔壁是一家中药店。再往那边走一点有一条小河。河上有一座拱桥，桥的那边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邮局。镇上的房子很有特点，二楼都比一楼伸出来不少，给人一种压迫感。我喜欢在

河边近距离地看船。有运货的水泥船，也有住人的木船。木船里面一般都很紧凑很干净，每个空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。有一次我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一条木船的内部结构，想搞清楚船上的人到底睡在哪里，因为没有地方放得下一张单人床。这时船老大探出头来说，小朋友，进来看看吧。也许是在地里偷黄瓜的经验起了作用，我想这么封闭的船舱进去之前要想怎么出来吧。我没有想出解法，就冲着他笑了笑跑开了。

如果外婆知道这事，她估计会到河边和船老大们打个招呼。外婆是个基督徒。妹妹告诉我，如果你问外婆，是谁害死了耶稣，她会说是她。外婆是不用时钟的，她根据窗户影子的位置来判断时间。我去偷吃过几次外婆床下的那盒蛋卷，确实又脆又香。估计外婆可怜我，知道我也呆不久，并没有戳穿我。她和外公生了六个孩子。可惜外公很早就去世了。我妈常说，外公当年只背了个背包就从温州到上海来闯生活，如果他还在世，我们不会过的这么苦。我要再大一点才意识到，爸妈心里比我们苦，因为他们是在大城市长大的。我并不觉得生活苦，因为我的起点低嘛。

----- 也不惹事

在我读二年级的时候，爸妈希望给我和我哥一个更好的教育机会，就搬家去了米泉县。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，当然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，米泉听上去就是个有吃有喝的地方。据说我爸本来要去三道坝的。由于以前工作表现出色，档案自然写的很好，被教育局马局长看到了就留在了米泉一中。在中国，个人档案真是幽灵般的存在。它会跟随你一生，而你却到死也见不到它。

我家住米泉一中的院子里。一中在县城的东边，我妈上班的二小在县城的西头。我自然而然地去了二小。我上学的路大概有两公里，横贯了县城最主要的一条街。那时候还睡午觉，所以我每天来回两次。一中的对面是个钢门钢窗厂。有一阵子那厂里在建房。那时的工地都会有一个临时的蓄水池。这自然会成为孩子们的戏水池。有一次我差点在那里淹死，后来就再也不进那个厂了。往西走有个电影院，十年以后我在那里领过奖。电影院前面有很大一块空地。各种新潮的娱乐活动常从这里开始，比如打台球，滑旱冰，跳交谊舞。上学一半路程的地方有个十字路口，算是县城

的中心。如果上学路上时间有多，我会去那里的新华书店和红旗商场逛逛。过了十字路再往西走有一座很普通的桥，桥的那边就是菜市场了。爸妈买菜的时候会带我们去吃羊肉串，那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羊肉串。大路再往西有一个街心转盘，县医院就那里。后来我妈在那里住过院，我在那里缝过针。转盘南边的13路公共汽车可以去乌鲁木齐市里。再往南一点就是二小了。县政府一定就在这条街上，估计是因为不能随便进去逛，我不记得具体的位置了。

毕竟我是去过上海的，县城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。附近的博格达峰却是非常震撼的。常年积雪的三座山峰并列在那里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整个山脉都是亮眼的橙红色。虽然不能再在戈壁滩上遥望地极，天天远眺博格达峰也足以让我浮想联翩。这时我妈会把我拉回现实，命令我去学习。虽然我妈是老师，我的学习并不出色。这在教师子弟里很常见。但是我不调皮捣蛋，这在老师们的男孩子们是不多见的。在二小自然没有人会故意欺负我。但是在学校之外就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每次过了那座桥，经常会有三三两两的维族小孩来抢劫我口袋和书包里的东西。估计是因为在大白天，他们并没有打我，就是推推搡搡要掏我的口袋翻我的书包，摆出一副不翻满意了不让走的架势。次数多了，我们达成了默契。他们看我远远地走过来就会

汇聚过来。我也不绕弯干脆径直地走过去。他们要掏口袋，我就像被警察搜身一样把手摊开，让他们掏。他们搜满意了，我就接着去上学。现在想来，我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伤害我。

这些经历显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不爱惹事，也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。但是其实我有一个能打架的朋友。我猜应该是他先认识我的，因为他本来在我妈教的高年级班里。有一年秋天的开学第一天，我们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训话。我一回头，他竟然在我后面一排坐着，所以我们也算同班同学。尽管他学习很差，我妈教他的时候对他还是很关心的。可能是这个起因，我俩挺投缘。后来他转去了一小，我们的联系就少了些。多年后他打遍县城成为米泉一霸，我考了县里的状元名列全疆第十四。虽然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，我俩还是很好的朋友。真正的友谊是不需要经常粘在一起的。可能这也是为什么，我两都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，而没有试图去影响对方。我上大学走之前，我们还一起吃过一次饭，后来就断了联系。我认识的不怕惹事的朋友里，不光有汉族的，也有一个维吾尔族的。我们是在一中校园里的露天球场打乒乓球的时候认识的。他打不过我，每次见到了就会来找我打。他偶尔会叼着根烟，显得很酷的样子。我从不抽烟，甚至有些讨厌烟味，但这也不妨碍我和吸烟的人交朋

友。不过我们那个年纪敢在大庭广众叼着根烟的都不是什么善茬。如果我早点认识他，也许就不会被劫那么多次了。然而谁都不可能随时随地保护你，人总要自己面对世界。我渐渐地理解了爸妈一定要我们回上海的原因。虽然上海的洋楼不能随便进去参观，至少四处闲逛还是安全的。不过当时我还看不到生活会有什么转机。我仍旧不起眼也不惹事。

----- 挣过面包

一中那边很久以前是坟地，二小却是在农田边上的。我们教室的后面就是一片农田，边上有一大丛枸杞。枸杞开始成熟的时候，绿叶配红果很有一番诗意。小朋友们可不管这些，下课的时候大家就围在那里，边聊天边摘熟了的枸杞吃。连吃几天之后，就有人开始流鼻血了。我也吃了不少枸杞但是还没到流血的地步，因为当时我干什么都是中不溜。学习自然也不出众。

我记得当时的数学课本里每节后面都会有一道思考题。有一道大致是这样的：一只青蛙在井里想跳出来。井有十尺深，青蛙一次跳两尺，会滑下去一尺再接着跳。问青蛙要跳几次才能出井。虽然我没做对，知道答案后，我很鄙视这种雕虫小技。当然我要到几年以后才能体会到，数学是一门处处严谨的学问。但是我更喜欢勾股定理那种简单明了又意想不到的大智慧。即使到现在，每每看到这些脑筋急转弯的数学题，我不禁想问，你们这么调戏小朋友有意思么？

当时我们年级学习最好的是一个姓璞的女生。她的姐姐在二小的时候据说也是第一名。我妈说她姐姐到了初中学习就不行了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妈当时对我要求没那么高。实在看我玩的太多，她会叫我到教师图书室里借两本书看。我喜欢自己胡思乱想，不太喜欢看别人写的东西。还留在记忆里的有一个童话故事。说是长工把金子塞在马的屁股里，骗地主说，这马拉金子。最后贪财的地主趁别人不在，用嘴去接拉出来的金子。多年以后我才理解，这是要有多深的阶级仇恨才能写出这样的童话呀。

除了学习，学校还是比较注重学生的娱乐活动的。有一年的元宵节，学校让小朋友自己扎花灯晚上带到学校去，看谁的花灯好看。我妈用破门帘上的竹片先扎两个五角星，然后再用短一点的竹片把两个平行的五角星扎起来。正中间捆上一个蜡烛，外面再糊上红纸。那时候红色的五角星是很让人兴奋的。我挑着那个五角星灯笼迫不及待地要去学校。我妈说，去了你就把灯笼放在我办公室里，去看看别人的灯就行了，你的灯这么好看，会被人抢走的。估计我妈也知道，这个要求太高，我怎么可能做到呢。那天刚下过雨，也见不到月亮。黑黑的校园里小朋友们的灯笼四处晃动。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个兔子灯。现在想来，那应该是在店里买的。我走到那颗枸杞附近的时候，突然

身后伸出一只手，抓住我提灯笼的棍子就跑走了。我跟着跑了过去，那高大的身影跳过一大滩积水，我就停住了。我当时站在水边，没有哭也没有叫。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被暗着抢。按照鲁迅的话说，我又一次面对惨淡的人生。

每年的六一儿童节，学校都要组织学生排着方队到街上游行。大家穿着白衬衣打着红领巾。领头的拿着根指挥棒，控制着大家的节奏。指挥棒的顶上是个红缨枪，下面是一个金黄色的球，很是精致。拿着指挥棒的是一个高年级的男生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教导主任的儿子。游行之前自然是要排练好几次的。作为给学生们的补偿，学校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面包。我吃过黄色的发糕和基本上算白色的馒头，这种上面黄下面白的面包还是第一次吃。我揪了一小块放在嘴里，酵母味很重。剩下的面包我一直不舍得吃，后来都干了。有一次我妈被我惹急了说，爸妈养着你们，你们也不挣钱，还不听话。当时我很有底气地低声提醒她，我挣过面包。

----- 我的天敌

被劫的次数太多了，我自然会向爸妈抱怨。要上五年级的时候，他们决定把我转到离家近一些的一小。一小在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往南一点的地方，所以我不用再经过那座桥。县里学校的老师多少都相互知道，所以教师子弟转学手续并不难。上学第一天，教导主任带着我到办公室找我的新班主任刘老师。那是一间好大的房子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在里面办公。可能是我那时比较矮小，感觉那间房子的房顶好高。主任让我先坐在门口的长凳上，他去和刘老师打个招呼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听着那边有个女声说到，老师的孩子我不要，你放到别的班里去吧。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，坐在那里看着地面。如果可以给当时的场面加个台词的话，我会按周星驰的风格说，难道我在戈壁滩上顶天立地的事，也要说来给你听吗？当时我没那么潇洒，刘老师也不是太倔强。

这下我不必再担心上学路上的安全了，可是学校里面就不像二小那么太平了。五年级的孩子有些已经比较健壮了，尤其是那些留级的。我这个瘦小的插班生自然成了他们欺负的对象。后来我似乎被班里那个姓马

的男生给盯上了。在学生眼里，有事告诉老师是一种没本事的表现。我虽然不起眼，但是也不想丢面子。有问题要自己解决，谁还没有个能打架的朋友呢。我的发小比我先转来一小，当时在另一个班。忍无可忍之下，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就去找他。我记得当时几个高高大大的学生正围着他坐在墙边聊天晒太阳。大家都有点惊讶，我竟然认识他。我把他叫到一边说，能不能和那个姓马家伙说一下，别来惹我了。我不爱惹事，只要能过平安的日子就行。事情被他几句话就解决了。几年后我再大一点，又遇到类似的事就涉及到人生安全了。我又找过他一次，就直接请他动手了。还好对方躲开了，没出什么事。我那时真是渴望世界和平啊。

虽然刘老师渐渐意识到我不像其他教师子弟那么调皮捣蛋，但是我也没给她争什么光。她是教语文的，我的语文学的很差，作文尤其写的烂。那时的语文课总是让我们背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，通过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。写篇文章一定要有个中心思想么？刘老师是班主任，所以不光教语文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操场里的单杠上玩。我瘦所以我可以轻易的爬上去，最后坐在横杠上，享受高高在上的感觉。有一次被刘老师看到了。后来上语文课之前，刘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训斥我，就你爬的最高，摔下来怎

么办！后来我爬上去之前都会四处看看她在不在。我的数学比语文稍好一点，但最多也就是中偏上。有一次教数学的璞老师出了二十道应用题，做完了就可以回家。无非就是些相遇问题追击问题之类。我第一个交了，就高高兴兴的收拾书包回家了。一小的校园太大，我们教室又在离校门最远的一排。我还没走出校门，就被璞老师派来的一个女生给叫回去了。话说她为什么一定要派个女生呢。结果，二十道题我错了十七道。最后我什么时候回的家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是这个命中率至今还没有忘记。后来我去合唱团滥竽充数。几十个的学生站成上中下三排，练些《春天在哪里》之类的歌。这次璞老师亲自出马，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叫回去做题。还补了一句，学习那么差，还参加合唱团。那个时候，两位老师应该算是我的天敌。

不忍再看

上了初中我的活动范围就大大的缩小了，因为我家就在一中校园里。每天上学都不出学校，给人一种命中注定离不开学校的感觉。比起小学，物理和英语是新课。我爸是高中物理老师，他要到三年后才会有机会教我。初中的物理好像是从研究弹簧称开始的，重量和弹簧的长度是个线性关系。总是让我们推算某个东西有多重，或者弹簧能拉多长。这些确实不能刺激我学习的兴趣。英语教完了字母，就学这是苹果那是橘子。我的语言能力比较差。后来我妹妹也来了新疆，我的英语老师也教过她。有一次在食堂碰见，他笑嘻嘻地对我说，你妹妹比你聪明可不是一点点呀。那时的老师大概都以虐心为乐。

我妈不会这么只说不做。她已经意识到，上了初中我的学习不能一直这么不温不火。那时学生考试多，其实也是考老师。邵校长会从内地买许多考卷回来，给学生考试，也通过学生的成绩考核老师。每次我考不好，我妈就直截了当地揍我。考虑到我和我妈的感受，此处略去一百字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怪过她，谁叫我学习不好呢。更悲催的是，我的班主任孙老师就住

在我家前面。他会双手背在后面再拿着一本书，若有所思的在我家门前走过。让我每次出门的时候，都有一种老鼠出门怕见猫的感觉。我妈正好相反，见了他会主动迎上去问我的情况。所以有时候，我妈比我还早知道我考了多少分，我挨打之后才知道具体考了多少分。老师的孩子也不容易呀。

我时常会和其他老师的孩子一起玩。学校周围的墙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都翻过了。南边的墙外有一条恶狗，会追着我们跑。那时我们不懂，靠嘴捕猎的动物有一种天性，你一转身它就会追上来咬。结果我们经常被那狗追的四处奔逃。我家后面那条叫尼罗的狗就友善的多。我每次路过见到它都会去摸摸它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它有一次竟然咬了我。据说是因为怀孕的狗特别敏感。当时我都吓傻了，根本不知道疼。就感觉大腿上有点热，我撩起裤子，大腿内侧有两个很深的血窟窿。我妈后来说，裤子上还有我的肉。后来我怀疑，尼罗一咬就意识到是我，就松口了。因为两个血窟窿并没有连在一起。无论如何，这狗后来被我们打死了。那一年我十二岁，我妈说那是本命年呀。

其实那一年，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基本都是本命年。我们年级在一排有三间教室的平房里上课。我们一班在中间，二班在我们的左边。再往那边是个工地，正在

准备盖一栋三层的教学楼。二班的左前方，摆了一整排建楼用的红砖。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五六个流氓，拿起砖头就往二班的门窗上扔。大家先是听到玻璃碎的声音，然后旁边两个班的学生就都汇聚过来站在旁边看。直到二班窗上的玻璃都砸没了，还是没有二班的同学敢出来，谁都知道外面有数不清的砖。有个流氓想冲进去，被一个扔出来的铁锹头吓回去了。这时二班的一个男生想冲出来，刚到门口，被一块飞来的砖头砸在头上，一下坐在门槛上不动了。接着又有几块砖砸在他身上，还是没有动。几个流氓看二班外边没什么可砸的了，又不敢冲进去，骂了一阵就从操场的小门跑了。后来我听说是因为二班的一个女生在上学的路上总受到流氓的骚扰。同班的几个男同学就去保护过她几次。估计流氓觉得丢了面子，便纠集了人来报复。那个被砸倒的男生没有死，但是书是没法读了。一中为了摆平这件事，就安排这个男生在学校里发报纸。每次我见到他，我都觉得我们活下来是一件偶然的事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我去上大学之前。在学校的办公楼边，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卡其布上衣，绿色的军装裤，肩上斜挎着一个装报纸的黄绿色书包。一只手像鸡爪似的压在书包上，每走一步都要吃力地挪着瘸了左腿。他的嘴有点歪，有没有流出口水，我不忍再看。

也算第一

据说每一个班毕业的时候都会和入学时人数不一样。留在教室的还需要继续读书谋生存。估计是老师也懂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道理。那时的课桌可以坐两个人，正好男生坐一边女生坐另一边。新学期开始，老师会让男生和女生分别按个头排成两队，然后一一对地安排座位。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并不相互了解。一个学期之后，就知道每个人的脾气喜好了。像我这种学习一般但注重生活质量的学生，一定要争取和一个看的顺眼的女生坐。毕竟我每天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比我妈还多呢。排座位的时候，我会数数我排到哪个女生。这很容易搞清楚，因为我个子小排在前面。如果需要，我会和前后的男生有意无意地换一下位置。那时的孩子成熟的晚，我们要到高二以后才有人谈恋爱。不过，和心仪的女生同桌还是很快乐的一件事。我上初二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一个铁皮的铅笔盒。上面是两个赛艇在蓝色的海面上飞驰。有一阵子，我们会一起在各自的铅笔盒上写上名人名言激励自己。这个铅笔盒至今仍旧在我的书桌上。那两个赛艇还在，但是上面曾经写过的字彻底被磨灭了，当年的同桌也早已失去了联系。

除了那个铅笔盒，我保存至今还有对打乒乓的热爱。现在我会时常去打业余比赛，有机会了还会去找世界冠军签个名。当时我们只能在水泥台子上打。一中的第一个乒乓球台是我爸建在我家院子里的。学生们知道了，放学后都会跑到我家来打球。后来学校在空地上建了十几个台子，我家终于清净下来了。那时我家住的还是土房子，比兵团里的房子高级一点的就是房檐有一排瓦，这样雨水就不会顺墙而下。房顶还是草和着泥糊的。那时大家一般在室内的房顶上会糊一个顶棚。就是用铁丝在椽子下缘的高度绷一个网格布满整个房间。铁丝的间距一般是报纸的宽度，因为大家都是用报纸糊顶棚的。这一方面会让房间好看一些，也会防止房顶上的土或草落到桌上床上。但是这是在屋顶不漏水的前提下。米泉的雨水明显比戈壁滩上多。有一次，偏偏是只有我和我哥在家的時候，夜里天降暴雨，很多家的房顶都漏了。报纸虽然兜不住水，但是可以挺一会儿。我哥就让我睡在我家那个土制的沙发上，因为那里上面还没漏。他就拿着一根棍子和一个桶，看着哪里报纸被水浸的快要撑不住了，就在最突出的地方用棍子戳一下，然后赶紧用桶接住流下来的水。如果你见过牛撒尿，你就能想象那水流下来是什么样子的了。后来我在沙发上睡着了，他在

凳子上坐了一夜。第二天雨过天晴，我好奇地去看了一下漏雨的地方能不能看的见蓝天。

我哥比我大三岁。我开始学几何的时候，证明题不会做就常去问他。终于有一次他不耐烦了说，自己去想！我就很委屈的告诉我妈。我记得我哥当着我的面对我妈说，他就是懒，这么简单的题，自己想一想就想出来了，还要来问。我妈怎么劝我的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就记得，我很生气，含着泪发誓再也不问我哥几何题了。那道题后来真的被我自己想出来了，而且从此我再也不需要问他了。我发现几何是一门很美的学问。简简单单地从几个浅显易懂的公理出发，就能推出那么多有意思的结果。比如勾股定理这么漂亮的结果简直太神奇了。给我一个直角三角形，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用平方。直到现在，我都会想象毕达哥拉斯当年和他的学生在讨论直角三角形的时候，也许某位的脑子里闪过，直角也许和面积有关，面积应该和平方有关。从此人类对数学的认识就彻底改变了。这种瞬间即是永恒感觉真是太让人向往了。

后来我特别享受做几何证明题。但是我比较懒，能用两个字表达的，我不会写三个字。所以证明一般都写的骨瘦如柴。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，你可以再写完整一些，让别人读的也舒服嘛。我有时比较倔强，

证出来了不就行了嘛。我这点倔强估计是从我妈哪里遗传来的。她就不屈不挠的带着我去几何老师家里评理。教几何的杨老师住在邮电局家属院，还是要走一段路的。现在想想，杨老师怎么可能站在我一边呢。不过我当时意识不到这一点，就很信服地接受了。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博士毕业的时候要准备幻灯片，我的导师给过我同样的建议，出去讲文章要有艺术。当然读博士需要排名的时候是很少的。初中的时候正相反，我们经常考试，而且每次都排名。渐渐地我在男生里可以排名第一了，可是全班排名总是在十名外徘徊。孙老师会打趣地笑话我，你就是考不过女生。直到初中毕业，这十朵金花都是我心中抹不去的痛啊。其实，女生比男生发育早，我的时机还没有到嘛。有几次我发现有些数学题全班只有我能做的出来。关系好的几朵金花会早点来学校，在交作业之前看看我是怎么做的。这让我觉得很有面子，不禁想起小学那次叫我回去做题的女生在哪里。大概是在初三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参加昌吉州的竞赛。当时我觉得考得很差，考完就灰溜溜的回家了，当然这个时候我妈已经不打我了。结果我竟然得了数学一等奖物理三等奖。事实上，我数学只考了三十几分，满分是一百。后来这事被传开了。经常拿第一的那朵金花开我玩笑说，三十几分也算第一。

还在路上

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妈做了件轰动全校的事。她把家里几乎所有的现金都给了我，让我一个人坐火车回上海。那个时候乌鲁木齐去上海的火车已经缩短到了三天四夜，是中国最长的直达列车。这时我们去乌鲁木齐已经比较方便了。我妈虽然做了这个大胆的决定，我上车的时候还是千叮咛万嘱咐。她个子不高，仰着头半趴在车身上和邻座的人打招呼，请他们在路上多照顾我。我坐在临窗的位置，旁边有两个大人，对面有三个大人。大家都有点新奇，这个妈胆子够大的，敢让这么小的孩子独自出这么远的门。我妈当时给我预备了几天的食物。我现在还记得的有许多水果罐头，那是她住院时学生们送的。钱是缝在裤子上的，我时不时会去摸摸还在不在。车上一定是也卖了站票给短途的人。旅客多的时候走廊甚至厕所里都是人。我怕位子被别人占了，就尽量不起来，下车的时候屁股都肿了。坐在窗边的好处是可以趴在茶几上睡觉，还可以看窗外的风景。火车出新疆需要一天时间，窗外的戈壁是十分熟悉的。穿过长城是在嘉峪关旁。那里的长城只有北京的一半那么宽，完全是一堵夯筑的黄土墙，直直地和铁轨相交。嘉峪关在黄土飞

沙之中，有一种任尔东西南北风，我自巍然不动的气势。过了嘉峪关就算是进入口内了。

这是我十年内第一次出新疆。我爸那时在常州教育学院进修，我妹妹一直在上海上学。那年暑假，我爸带着我和妹妹游历了中国最富裕的江南腹地。我家祖籍绍兴，但这次是我第一次去。那时的街道两旁经常能看见装酒的坛子，显示着黄酒对这个城市的重要性。绍兴的燕子也很有意思。傍晚时分在一条主要的街道上，一边的电线上密密麻麻的落满了燕子，街的另一边的电线上却一只都没有。如果有电线是横贯街道的，燕子也不会落在街道中线的另一边。这个奇观我至今都记得。其实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看见燕子真的有个剪刀似的尾巴，和语文书里说得一样。这里还有语文书里提到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。同是树上据下来的，我的树桩凳和私塾里精致的桌椅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我在百草园里并没有看到太多花草，那里远没有我家后院的戈壁滩来的大气。爸爸对绍兴很熟，他买了一包梅干菜带我们上了一个脚划的乌篷船。船家戴着顶乌毡帽，脚熟练地划着大浆，手里拿着个小浆把握方向。船在小河里一摇一晃嘎吱嘎吱地前行。船篷没有外面看上去那么小，我们仨在里面嚼着其貌不扬的梅干菜，欣赏着两岸的水乡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我想如果我在这里长大，是不是可以乘着这脚划船上学。

我爸会说几句绍兴话，但是船家说的绍兴话就很不容易懂了。相比起来，南京话要比绍兴话好懂的多。

我有个舅爷爷就在南京。他们夫妻俩都在华东工学院当教授。我们去的时候，老人家穿着背心短裤摇着个芭蕉扇。舅奶奶说，有个苍蝇飞进来啦。舅爷爷就拿着苍蝇拍达拉着拖鞋找那只苍蝇。我没好意思说出来，才一只苍蝇还需要打？傍晚的时候，舅爷爷带我们去校园转转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阶梯教室，上个课还可以有电影院一样的待遇。到了南京自然是要去看桥。南京长江大桥比书本上画的还要雄伟。我爸告诉我桥上那三面红旗代表的是“大跃进，总路线，人民公社”。我听上去的感觉估计就和我的学生听我提起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一样陌生。那可都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智慧结晶呀。在桥上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长江。江水沉稳地向东流去，平淡无奇却势不可挡。和长江不同，富春江就显得清秀飘渺。在桐庐的时候，早上的江面上浮了一层雾根本看不到水。早起的船家两脚踩在小船的船梆上，手里拿着桨向江心划去。他的双脚像粘在船上一样随船晃动，身体却可以保持基本不动。有时好像故意的用脚让船晃的更厉害些，像是在给我们表演杂技。再过一会儿，人和船就漂浮在云里了。有这神仙般的场景，难怪严子陵会宁愿在这里隐居。

富春江再往下就改名钱塘东流入海了。我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大海应该算是在普陀山。大海和戈壁一样都一眼望不到边，但是蓝色给人一种浪漫和丰富的感觉。去普陀的游客一下船，就会有当地的渔民家属吆喝自家的居住条件和价格来吸引客人。我爸看见一个阿姨站在那里有点不知到怎么吆喝，就问她多少钱条件如何。后来我们吃饭都是和她还有一个老奶奶一起的。老奶奶有个佛龕，时不时会去拜一拜。我和妹妹就好奇的问，应该怎么拜呀。怎么拜都行，心诚就可以了，老人答道。我爸后来告诉我，沿海地区信佛的人特别多，因为男人都要出海打鱼谋生养家，大海又变幻莫测。这不得不让我思考人生和命运。其实我们或早或晚都会像悟空一样，学会与命运携手同行。但是当时的我，在游历了江南各地之后，深深地感到世事不公。我时常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的同龄人能在如此好的条件里成长，而我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。再回到新疆，巨大的落差触发了我与命运抗争的激情。后面的故事虽然更精彩，还是让它先留在记忆中吧，因为我们都还在路上。

